

陈志辉 著

民族精神谱

《史记》

人物述评

北京
范大学出版社



民族精神谱

——《史记》人物述评

陈志辉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0 号

民 族 精 神 谱

——《史记》人物述评

陈志辉 著

袁 牧 审定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河北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875 字数: 143 千

1992 年 8 月 第 1 版 1992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12 000

ISBN7-303-01732-1/K·46

定 价: 3.40 元



作者小传

陈志辉，男，江西省余江县人，1933年生。大学本科毕业(函授)，1951年参加工作。历任小学、中学教师，教龄42年。中学高级教师，江西鹰潭市中语学会秘书长，政协鹰潭市委员，现任江西省余江县教研室中学语文教研员。

青年时期，既已许身孺子，矢志教育，50年代开始发表文艺作品和教学论文。57年不幸被错划为右派，78年改正错案，恢复工作，皓首孜孜，励志教研，发表论文多篇。《论教师的语言修养》获全国农村中学语文教改研究会91年教研论文一等奖。参加编写《初中语文引读导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学生作文辅导大全》(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班主任伦理性谈话实例》(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学生作文精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文言文赏读实践》(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等书。在全国发行，颇获好评。

编者的话

卓越的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的不朽巨著《史记》不仅是一部“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巨著、文学宏篇，而且是一部民族精神文明谱。历代学者对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研究颇深，论著甚丰，而对其民族精神和道德力量涉猎不多，论述欠详，迄无系统赅备之论。本书另辟蹊径，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为依据，试图从民族精神和传统道德方面论述《史记》对民族精神文明的贡献。欲以启兴救弊，弘扬民族精神，光大传统道德，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本书从热爱祖国、振兴民族，关心人民、造福子孙，锐意改革、开拓进取，见义勇为、扶贫济困，正直廉洁、奉公守法，勤劳俭朴、艰苦奋斗，诚实守信、尊老爱幼，修身励志、自强不息等八个方面，将《史记》中的有关史料搜集整理，去粗取精，归类叙述，逐一评价。叙史和评论结合，自成科学体系；历史和现实相融，富有时代气息。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是一本弘扬民族精神，光大传统美德，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益读物。尤宜做为中等学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师生加强自我修养的辅助读物。

编者

一九九二年六月

· 1 ·

目 录

序 言.....	1
绪 论.....	5
一 热爱祖国、振兴民族.....	19
二 关心人民、造福子孙.....	57
三 锐意改革、开拓进取.....	85
四 见义勇为、扶贫济困	116
五 正直廉洁、奉公守法	140
六 勤劳俭朴、艰苦奋斗	157
七 诚实守信、尊老爱幼	173
八 修身励志、自强不息	189
后 记.....	211

序 言

袁 牧

《史记》是一部“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鲁迅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史学和文学两方面肯定了它的性质和伟大成就。它是文学的历史，又是历史的文学，是历史与文学完整统一的典范。历来学者对《史记》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研究颇深，论著甚丰。对《史记》丰富的思想内容和深刻的人民性，对《史记》中的爱国思想，当然也是诸多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有的说《史记》一方面揭露了统治者及其爪牙的无比丑恶，画出他们的真实脸谱；一方面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与愿望，歌颂人民及其领袖的起义反抗，歌颂可歌可泣的爱国英雄，歌颂救人困急的侠义之士，发扬了民族的优秀传统，体现了作者的哲学思想、历史观、政治观、经济观点以及伦理道德观点等。有的说《史记》无情抨击和讽刺专制帝王与贪官污吏鱼肉人民、剥削人民的残暴行为，洋溢着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疾苦的感情，表现了反对暴君、暴政、豪强、酷吏的思想。而对爱国爱民、品德高尚、急公好义、尚义任侠和对社会事业在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教育各方面有贡献的各种人物，都给予很高的历史地位和公正的评

价，出身微贱的下层人物同样受到重视。有的还举出管仲、晏婴、孔子、荀子、屈原、贾谊、廉颇、蔺相如、鲁仲连、田单、王蠋、信陵君、侯嬴、荆轲、聂政、陈涉、项羽、李广、郭解、淳于髡等，说明这些身分不同、事业各异的人物，都能让他们在历史舞台上放射出不灭的光辉。对那些保卫国土、忠于国事的历史人物，《史记》以饱满的热情和敬意去歌颂他们，赞扬他们的高尚品质，突出他们的精神面貌，并作出正确评价，等等。

陈志辉同志爱读《史记》。他在高度评价《史记》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同时，认为《史记》“更重要、更宝贵的是它的精神力量和道德价值。”他认为前人对此“涉足不深”、“论述欠详”，于是专门写了这本《民族精神谱》，以马克思主义论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从民族精神和道德传统方面来论述《史记》对民族精神文明的贡献。从热爱祖国、振兴民族；关心人民、造福子孙；锐意改革、开拓进取；见义勇为、扶贫济困；正直廉洁、奉公守法；勤劳俭朴、艰苦奋斗；诚实守信、尊老爱幼；修身励志、自强不息八个方面，将《史记》中的有关史料归类叙述，逐一评价，力求叙史与评价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融。这无疑是一件对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益的工作。全书史料收集较全，以上述八个方面为纲，有详有略，正面举例的《史记》中的历史人物达百余人次，反面对举的还不计在内。书前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绪论》，其实是一篇总论，作者的观点都写在里面了。八个方面是分论，“后记”则是写作这本书的现实目的。

全书虽然叙多于评，评中也不无可议之处，但从总体来看，它表达了作者对传统与现实关系的一种看法和感受，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点可资参考的历史的、文化的

背景依据。作者在这里付出的精神劳动,是值得称道的。

据我了解,作者并非是从事中国文化史、思想史或学术史的研究者,所以不一定从一种学术见解上来要求和看待这本书。但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却又是一个如何看待传统文化的大问题,是近几年来学术界颇有争论的热门话题。作者在本书中未曾对此作较深层次的探讨,但作者的历史主义的态度还是很鲜明的,那就是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实际出发,对集民族精神文明于大成的《史记》进行认真、审慎的分析与选择,对渊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使传统文化更具有生命活力。作者没有割断历史,也没有割裂传统;既避免了颂古非今的保守主义,也否定了无视传统的虚无主义。

书成后,作者请我写序。我对此缺乏研究,没有发言权。除写了上面的一点读后感外,作为一点补充,也为了给读者阅读这本书提供一点思考性的材料,我想摘引1989年第1期《求是》上王蒙同志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刍议》中的几段话,作为这篇序言的结束。

“我国有独立的、引为骄傲的、至今没有中断过的古老文化传统,又在近代以来,处于东西文化的冲撞之中。人们时而感到我国文化传统的伟大与至今未绝的生命力,时而在世界先进文化面前感到我国固有的传统之不足及其痼疾之深重。

“不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就没有中国的振兴,就没有民主与科学,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就没有现代化。

“不珍视民族文化传统就没有世界上的地位,没有起步的起点,没有了信心,也没有了依据。

“……不管民族文化虚无论者的动机如何,自以为先进和热烈,这种论者无法在中国站住脚跟,无法做出任何有益的哪

怕是小小的贡献。

“西方文化的皮毛接受与偏激鼓吹，在强大的固有文化传统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是近代以来我国常演的历史悲剧、文化悲剧。每一次悲剧都会使得两种极端立场变得更加极端。即，使得坚持封闭者更加一意封闭，使鼓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更加悲观虚无，直至否定中华民族的存在权利。

“只有一条出路，把世界先进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世界先进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中富有生命力的部分结合起来。于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于是有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不论怎样懂得、珍视、爱惜甚至善于利用固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不开放，不发展，不再造，传统文化就无法生存下去，就无法获得新的发扬光大。

.....

“开放是生命力和信心的表现。具有强大的传统和独特的瑰宝的中华民族文化一定能在开放中获得新生，获得个性的保持，获得新的尊严与新的魅力，并对世界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袁 牧

1989年5月31日于南昌

绪 论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而富有智慧的祖先，在长期的劳动和斗争生活中，以其非凡的创造力，创造了极其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凝聚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养成了优良的道德品质，从而汇集铸成为我们特有的民族精神文明。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和道德品质，通过历史不断涌现出来的优秀子孙——民族英雄、模范人物和睿智隽秀之士的具体思想行为表现出来，发扬光大而传之无穷，成为我们民族和全体人民的精神支柱、生命火花和前进动力，不断推动着社会历史前进，促进着民族的繁荣昌盛，使我们中华民族得以长期屹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为世界精神文明增添光彩。

这种民族精神文明，最初以口为碑，流传于民间的神话传说。如《淮南子》中的《女娲补天》，描写了远古女英雄女娲炼石补天，拯救人类的英雄行为；《后羿射日》歌颂了征服自然，为民除害的英雄。《山海经》中的《夸父逐日》，反映了古代人民与大自然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表现了自我牺牲、为子孙造福，为后继者开拓成功之路的精神品质；《精卫填海》通过少女精卫化鸟，誓向大海复仇的悲壮故事，反映了我国远古人民与自然作斗争的勇敢、坚毅精神；《鲧禹治水》通过记叙鲧禹父子治理洪水的故事，表现了古代人民战天斗地，为民兴利除害的精神，等等。

我们的祖先创造了文字以后,出现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不仅再现了我国古代广阔的社会画面和当时人民的文化水准,也反映了古代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品德。如《邶风·七月》、《魏风·伐檀》、《硕鼠》等写了人民的勤劳品质,以及反抗压迫、剥削的精神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秦风·无衣》、《小雅·采薇》等,则充满爱国激情,表现了当时人民团结友爱,同仇敌忾,保卫国家的大无畏爱国精神。《诗经》中大量反映爱情和婚姻问题的诗篇,则表现了古代青年男女真挚相爱,忠贞不渝,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道德品质和纯洁、热诚、朴素、健康的美好心灵。《诗经》中还有不少政治讽刺诗,揭露当时政治的腐朽、黑暗,讽刺统治者的罪恶丑行。反暴刺贪,祛邪扶正,表现了人民的反抗精神和正义行为,如《邶风·相鼠》,扯碎了统治者的道德伪装,揭露了其腐朽本质,等等。

我国最早的散文集《尚书》,虽多属政府文告,但也多少反映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品德,如《盘庚》反映了要同心协力,共济时艰的思想;《无逸》告诫人们要勤劳进取,不要贪图安逸、享乐;《秦誓》写了要悔过自责的品德等。

历史散文《春秋》,微言大旨,一字褒贬,反对动乱,主持公正。《左传》敷演《春秋》大义,进一步表现了民本思想、爱国精神,表彰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关心国家命运,对人民有贡献的人物,歌颂其精神品质。如郑国弦高的犒师卫国,楚国申包胥的哭秦求救等。《国语》也丰富了民族精神宝库,如《厉王止谤》,揭露厉王倒行逆施。残民以逞的暴行,表现了人民的反抗精神。《战国策》中也记载和歌颂了一些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的人物及其精神品德。如邹忌之讽齐王纳谏,冯谖之焚券市义,鲁仲连之义不帝秦,荆轲之刺秦王等。

春秋战国之交，社会急剧变化，学者蜂起，百家争鸣，虽其主张不一，但殊途同归，其所宣传的民族精神则基本趋于一致，爱国爱民的思想，改革进取的精神，正直诚实的品德，勤劳俭朴的作风等民族精神和道德风尚，在各家的言论中都有所阐述，有所肯定。如孔子讲“仁者爱人”，“使民以时”，反对横征暴敛，说：“苛政猛于虎”，表现了爱民思想；他的“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精神，积极进取的精神，视富贵如浮云的品德，一直成为后世的楷模。墨子讲“兼爱”、“非攻”；许行主张“躬耕”；孟子主张省刑薄赋，提出“民为贵，君为轻”；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庄子的不与世俗同流合污；韩非的法治主张和改革精神，都体现了民族精神的某一特点。

上述人物及其著作，都在不同方面丰富了我们的民族精神宝库，是我们中华民族一宗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

但是，应该承认，上述各代哲人、学者在记述和阐发民族精神文明方面却并不全面，往往只有零星的、片断的记载，而且多半是不自觉的记述和反映，只是在宣传其个人主张和学术观点时作为论据，加以引用。至于封建社会法定的所谓道德经、女儿经之类，则完全抽去了民族精神的本质，充斥着封建伦理的糟粕，失去民族精神的光采。

真正自觉地、全面而系统地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和优良的道德传统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全面的总结，并附之于具体的人物身上，赋予血肉和灵魂的，则只有千古一人——司马迁乃遂从百骑往驰三》，熔铸了民族精神的灵魂，民族道德的精英。

可惜，历代的文人学者，却往往只注重其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而忽略其精神价值和道德力量。对其史学和文学的成

就,钻研颇深,论著甚丰,而对其精神内涵则涉足不深,论述欠详,颇违于作者原旨。

诚然,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伟大的文学家。他的不朽巨著《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巨大的历史著作,创纪传体文学的源流,而且也是一部卓绝的文学鸿篇,开传记文学之先河。鲁迅称誉《史记》“逸响伟辞,卓绝一世”,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精当地从史学和文学两方面肯定了它的伟大成就。但更重要、更宝贵的是它的精神力量和道德价值。

我每每细读《史记》,反复吟咏,常常中夜奋起,不能自己。深感在它流畅的文字背面,在众多的光采夺目的人物身上,还蕴藏着巨大的精神威力。读过之后,闭塞的心灵往往被作者在其本纪、世家、列传中塑造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所攫住,深深地受到感染,受到震撼。他们的举止言行,音容笑貌,跳越千古时空,跃然浮现眼前;他们的思想品德,精神面貌,冲破历史云雾,撞击蒙昧心灵,使我勃发思古之情,顿生爱憎之心;或为之感慨流涕,或为之击节赞叹,或对之横眉怒目,或鄙而嗤之以鼻。中国古老的精神文明和优良的道德传统,霎时放射出灿烂的光芒,产生了无穷的力量,把我带进了民族精神文明的殿堂,使我的精神受到鼓舞,心灵得到净化,使我的渺小之躯顿时登上了民族精神文明的高峰。

到此因悟:司马迁不仅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空前杰出的思想家,民族精神文明的集大成者,民族传统道德的播火人。《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文学宏篇,而且是一部伟大的民族思想文化史,一部伟大的民族精神谱,一曲民族精神颂,一盏民族奋进灯:它

所产生的精神凝聚力和道德感召力是极其巨大的。它不仅规范着历代士大夫阶层和普通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行,而且直接影响着历代统治者的政策和行为。更重要的是《史记》表现出来的精神品德烛照着整个中华大地,感召着全体庶民百姓,为全民族、全体人民所奉行、恪守,它真是无所不在,无人不照,无往不胜!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文明的贡献实在是无法估量的。《史记》的精神价值远远超过了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不愧为民族精神遗产的瑰宝。

司马迁的为人和写《史记》这件事本身就是民族精神文明的集中表现,是民族精神文明宝光在他身上的闪现。

他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但他不甘沉沦,在逆境中奋起,勇敢地做人,发愤而著书,以坚强的毅力完成了历史巨著,作出了伟大贡献。

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北)。他的卒年已不可考,大约卒于公元前87年,即武帝末年。他的一生,据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推断,当是“与武帝相终始。”

司马迁的先代“世典周史”,他的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司马谈学识渊博,很有抱负,具有独立见解和批判精神,曾为文“论六家之旨要”,批判儒、墨、名、法和阴阳五家,针锋相对地指责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这实际上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发此宏论确实需要不凡的胆识和足够的勇气。司马谈的学术思想和批判精神,对于司马迁的思想和治学态度很有影响。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秉承父志,着手搜集资料,准备纂写《史记》。

司马迁少年时期是在家乡度过的。他从小爱好读书,热爱

劳动。“年十岁则诵古文”，稍长，“耕于河山之阳”。青年和中年时期，曾经三次漫游，“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峰、厄困鄆、薛、彭城，过楚以归。”后又奉使“西征巴蜀，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常侍从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大半个中国。所到之处，他考察社会风土人情，访问各处名胜古迹、耆老故旧，收集大量历史故事和文物资料；接触人民的实际生活。这一切扩大了他的视野，开阔了他的胸怀，增长了他的见识和才干，对他的政治见解的形成和丰富《史记》的内容有重大的影响。他奉使西南夷复命之际，其父谈“发愤且卒”，司马迁“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迁“俯首流涕”，聆听父亲的遗嘱，对父亲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父亲死后三年，继父之职为太史令，有机会阅览“史记、金匱石室之书。”益发坚定了著书的信心，决心当仁不让，著述《史记》，以“绍明世，正《易》《传》，经《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集民族精神文明于大成（以上引自《太史公自序》）。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的时候，巨大的灾祸降临在他的头上。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发生了李陵出击匈奴，兵败被俘投降的事件。汉武帝询问司马迁对此事的看法，司马迁根据平时对李陵的了解，据实陈情，认为李陵并非真心投降，而是想找机会报答汉朝（李陵变节投降是不对的，司马迁为其开脱也是错误的）。司马迁与李陵交往并不深，“素非能相善也，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但极尊重李陵的人

格，称赞他“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认为他“有国士之风”。因而对他的被迫投降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当武帝问到他时，他便率直地为李陵辩答，说“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最后在“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的绝境下，犹能“一呼劳军。士无不奋起。躬自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弓，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且李陵平时能“与士大夫绝甘分少，得人之死力。”认为李陵“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其以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报任安书》）虽然，李陵投降是不对的，但汉武帝把李陵的老母妻子打下天牢，处以死刑却过于刻薄寡恩。武帝也根本不体察司马迁的“拳拳之忠”，反而认为司马迁替李陵游说，与李陵内外勾结，里通外国，残酷地处以腐刑（阉割）。这是当时一种最残酷、最可耻的刑罚。这对司马迁是莫大的侮辱和沉重的打击，对他震动极大。使他对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性和上层社会的黑暗有了很痛苦的感受，极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促使他退而自惟，从古代那些为人称道的“倜傥非常之人”那里得到启发，受到鼓舞，并从而汲取了精神力量。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些为人类、为社会、为子孙后代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倜傥非常之人”遭受各种折磨，这似乎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共同命运。他决心与命运抗争，以伟人为榜样，隐忍苟活，发愤著书，以鸣其不平于天下后世。他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